

## 目 录

## 一、先声：邓小平在 1975 ..... (1)

等待。

等待了许久、思考了许久的邓小平，“升帐”主政中国。

全面整顿、全党要讲大局。急急如律令。

“先锋官”万里往返冲杀于万里铁道线……

“中军官”胡耀邦活跃呐喊在中国科学院……

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婉言“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1975 年的中国，风云突变，幻化无常。

## 1-1 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令

万里勇当“开路先锋官” ..... (1)

## 1-2 钢铁工业闻风而动

农业战线风雷激荡 ..... (21)

## 1-3 人民子弟兵提防野心家

教育革命“老九不要走” ..... (30)

## 1-4 评《水浒》宋江架空了晁盖

反“右倾”桃花源人再下沉 ..... (50)

## 二、惊变：中国 1976 ..... (62)

龙，中国人的图腾。

龙年，主凶，主吉？

9月大悲，10月大喜。

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举国痛悲；

10月6日，“四人帮”束手伏擒，举国皆欢。

悲也天安门，喜也天安门。

华国锋成了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这是华国锋时代的开始，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

### 2-1 “你办事，我放心”

政坛“黑马”华国锋 ..... (62)

### 2-2 “过去”与“既定”区分正邪

以快打慢“四人帮”伏法 ..... (78)

### 2-3 举国揭批“四人帮”

广场兴建纪念堂 ..... (93)

## 三、徘徊？华国锋色彩的 1977 ..... (107)

“萧规曹随”，如临深渊。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思想到行为。

“毛主席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

于是，邓小平仍要虎踞笼中、“以观后效”！

但人心不容被复制，跨越冰山，邓小平从容走来。

似春风徐来，一代学子走进了大学的宫殿。

### 3-1 两大问题如芒在背

“两个凡是”赫然出笼 ..... (108)

### 3-2 华国锋主导三月会议

邓小平复出三中全会 ..... (114)

|     |                                |       |
|-----|--------------------------------|-------|
| 3-3 | 神州制造新崇拜<br>经济又现“洋冒进” .....     | (120) |
| 3-4 | 迷雾中波起澜兴<br>邓小平自告奋勇 .....       | (135) |
| 3-5 | 分歧战未见分晓<br>十一大使命未酬 .....       | (147) |
| 四、  | 前奏：讨论真理标准的 1978 .....          | (153) |
|     | 血，在流淌。                         |       |
|     | 张志新、遇罗克、“四五”烈士……的血，融入思想解放的     |       |
|     | 历史长河，激活了一滩死水，徘徊的中国掀起波澜，吹响了东方神  |       |
|     | 曲的前奏。                          |       |
|     | 死水——“两个凡是”的一潭死水。               |       |
|     | 波澜——真理标准讨论掀起的波澜。               |       |
|     | 前奏——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       |
| 4-1 | 遇罗克葬身《出身论》<br>张志新问天“谁之罪” ..... | (153) |
| 4-2 | 九死一生献国策<br>四五运动起狂飙 .....       | (165) |
| 4-3 | 邓小平吹响号角<br>理论界率先发动 .....       | (178) |
| 4-4 | 真理标准只一个<br>左倾禁锢万千重 .....       | (202) |
| 4-5 | 邓小平支持一下<br>罗瑞卿临终冲刺 .....       | (215) |
| 4-6 | 宋平表态应四方<br>人民思想大解放 .....       | (231) |
| 4-7 | 《中国青年》高手布旧<br>“谭老板”好文迎新 .....  | (254) |

## 五、转折：伟大的里程碑矗立在 1978 ..... (262)

薄一波等 61 人是“叛徒”吗？

案牍如山，冤案、假案、错案。

谁对了？邓小平举荐胡耀邦，“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谁错了？华国锋作了检讨，“两个凡是”终被抛弃。

36 + 5，是一个充满艰辛的终点，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从此，举国一致：“三中全会以来……”

### 5-1 冤案一理

人心大喜 ..... (262)

### 5-2 政协工青妇

一切要正常 ..... (276)

### 5-3 话问题解放思想

谈建设实事求是 ..... (289)

### 5-4 新时期的新纪元

划时代的里程碑 ..... (311)

## 一、 先声： 邓小平在 1975

等待。

等待了许久、思考了许久的邓小平，“升帐”主政中国。

全面整顿，全党要讲大局。急急如律令。

“先锋官”万里往返冲杀于万里铁道线……

“中军官”胡耀邦活跃呐喊在中国科学院……

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1975 年的中国，风云突变，幻化无常。

### 1-1 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令 万里勇当“开路先锋官”

“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

“等待。”

这是 20 世纪中国两位世纪伟人的时空对话。

问话的是毛泽东，回答者是邓小平。

这是只因毛泽东才成其为一种问话的问话，这是只有邓小平才有的一种回答。

“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被错误地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放江西。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步兵学校，工作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厂校两地之间的田间踏出了一条坚实的“邓小平小道”。

“等待”。在这条坎坷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正是在这三年的思考中，使邓小平率先达到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也正是这种思考的深度和等待的高超艺术，酝酿和造就着20世纪中国“世纪伟人”邓小平。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延伸出来的。芬兰政府首相曾这样说：“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一线阳光穿云而出，笼罩中国大地上空的“左”倾浓雾，被撕裂出一条光明的缝隙。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有所转变。在场的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随即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以制造舆论，为正在江西的邓小平复出创造条件。

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很好地抓住了历史机遇，迅速地做出了恰当的反应。1972年8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了林彪的罪行，并作了一些自我分析。同时恳切表示，希望能为党和国家再做几年工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很快作出反应。8月14日，老人家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过去我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全部内容，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活动，让他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解放邓小平作了准备。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离开三年多的北京。

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并通知全党。

8月，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领导国民经济工作。

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扬邓小平：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吧，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974年，中国高层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筹备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politics 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politics 在英语中是“政治”的意思，周恩来当然懂。“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

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的话，决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地位与作用。

“等待”。西方人似乎也读懂了邓小平，对“等待”作出了非常合适的诠释——“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四人帮”“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仅如此，大会还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这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邓小平复出主政中国。

“受命于危难之中”，此时接手主政的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个严重滑坡的国民经济形势。

1974年全年统计表明，工农业生产总值仅比1973年增长1.4%，只完成了计划的95.60%，除粮食增长较多外，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所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与此同时，“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还在继续着全国严重混乱的形势；“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有所松动的政治局势依然十分严峻。

然天降大任于斯人。面对棘手的形势，邓小平决意进行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实，这就是3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邓小平后来自己就这样讲过：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在1975年3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要把握发展国民经济这一大局的问题。他批评了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倾向：“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没有侈谈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套话，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实事求是地告诉与会者：

目前的生产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在全面整顿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个大局观：“国际方面的斗争，

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不无焦虑地说，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这次会前的一个插曲，反映出此时邓小平这种不能等的心情是多么的急切与坚决。当省委书记们争相与他握手时，他突然一摆手，严肃地说：不握手了，现在工业形势很不好，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

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个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毛泽东这时提出了三条指示，被邓小平机敏地抓住了契机，以此作为号令全国、全面整顿的纲领。7月4日，他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会上谈话时，更鲜明地指出：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

9月10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研室7位负责人谈话，强调要全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批评现在的宣传（即“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这次谈话触发了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想要写一篇全面论述和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文章。过后几天，他又读到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胡乔木感到为全面整顿作思想理论准备，也很需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9月18日，胡乔木即找邓力群指出，文章的主题是全面宣传三项指示，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成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9月1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拟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打算。邓小平表示赞成，要他们抓紧写出来，并说：如果文章写得好，可以约几位总理研究一下，送毛主席审阅同意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的意见向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作了传达。

邓力群立即找人一起动手，把1975年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收集起来加以研究，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贯彻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的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拟就提纲后由4人分两组并行作业各写出一份草稿。邓力群看了这两份稿子，都不满意，决定重写。由邓力群口授，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

《论总纲》这篇文稿相当集中地阐发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全面整顿的思想，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三项指示作为实现四化的纲领，并对其中每一项指示赋予新的含义，尽量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全面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尖锐地揭露了“四人帮”，既有深刻的说服力和强烈的号召力，又有尖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

文稿首先指出，毛主席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在当前，必须“用这个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整顿是重点。”

文稿指出：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係，总是把政

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稿指出，当前斗争的特点是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文章回顾了历史上的实例后进而指出：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文稿提出，检验学习理论成绩好坏、大小的“唯一标志”是：“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文中引经据典，毫不含糊地提出：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

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稿批驳了那种鼓吹“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就搞上去了”的错误观点：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力气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相信。

文稿总结、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几个要点：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其核心是责任制，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这篇文稿集中地概括了整顿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探索了当时的中国怎样摆脱动乱局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路径，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虽然没能公开发表，但文稿的精神实际上已经贯彻到整顿工作中去了。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论总纲》被批判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姚文元对该文写了47处批语。按照“四人帮”定的调子，《论总纲》被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稿虽然阐述的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思想，但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后来，他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

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号召，邓小平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帷幕。

万事开头难。全面整顿从哪里下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

铁路运输，被人们喻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如果大动脉出了毛病，那么东西南北中各处各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要受到严重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冲击，问题严重。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许多路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邓小平选择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充满风险。这步棋下好了，会带动全盘活起来；下不好，后果则难以预料。

担负“开路先锋”重任的铁道部部长，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万里，他是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刚刚被任命的“新官”。

1975年1月28日，万里刚刚上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

邓小平说：“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谈一谈。”

深知重任在肩的万里，已迅速进入了角色。他扼要地汇报了目前铁路的严重情况，指出：现在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文化大革命”以来，全路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所增加，可是运输生产不但没有随着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1965年平均日装车5万辆左右。现在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只有3万多辆），减少了1/5，按实际能力，应达到6万辆左右。二是事故惊人。1965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1974年多达750多起。三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全路机车完好率只有6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特别是徐州、郑州两大铁路枢纽，堵塞更为严重，影响大部分铁路干线不能正常运行……经初步了解，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这是涉及到铁路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个体制问题。铁路运输生产问题十分严重，不过我看只要

江苏省委态度明朗，问题就不太难解决。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当即指示：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过去我们的正点率一直是很好的，在全世界都数得着，现在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行？

万里表示：铁路问题复杂，不仅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9天之后的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副总理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见万里，在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他指示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要求文件中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不要写成业务性的；文字不要太多，文章不要太长，关键的东西要写明白。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当文件初稿完成送他审阅时，在“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他亲笔加上了这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的要害是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并向它宣战。

很快，文件草稿送中央政治局讨论。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遇到阻力就通过了。之后，报毛泽东审定。很快，毛泽东也“圈阅”了。1975年3

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有名的“中发[1975]9号”文件。

9号文件的特点是,解决铁路问题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措施具体有力。文件开宗明义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文件下发后,人们把它概括为“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文件作出了五条决定,主要是:

——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有关省、市、自治区统一部署。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与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同沿线群众的关系。

——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必需的,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

——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对于一切破坏活动,都要严惩。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历史证明:9号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铁路整顿过程中发挥了纲领性作用,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整顿中也

发挥了指导性作用。

在 9 号文件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邓小平在讲了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后，着重谈了反对派性问题。他严厉地指出：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是不可行的。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

如何处理闹派性的头头？邓小平指出，办法就是“从原单位调开”，“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

邓小平最后说，他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他要求铁路部门 3 月份进行深入的动员，包括职工家属和沿线农民，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一个文件，一个讲话，全面整顿的第一战打响了。

“尚方宝剑”在手的万里，大张旗鼓地“放火烧荒”，东讨西伐，南